

新中國的生誕

林語堂新著

香港民社發行 民華譯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月初版

目次

| 目次 | 目 |
|-------------|----|
| 四十年來的醞釀 | 一 |
| 我們的舊文化能救中國麼 | 三 |
| 新的民族主義 | 六 |
| 暴風雨的前夜 | 一九 |
| 壓刀反動與爆發 | 二一 |
| 蔣氏的為人與策略 | 二七 |
| 日本爲什麼要失敗 | 四二 |
| 中國的前途 | 四九 |

四十年來的醞釀

中國有一個偉大的過去，對於古代的中國人，中國的文明，不是文明「一」，而是「唯一」的文明；中國的生活方式，且爲人腦所能想像之唯一的。此非驕狂，而爲客觀的事實，蓋中國古時，週圍都是野蠻人，並不知有別種可與其自己比擬的文明。但現代知識的探海燈却顯出其祇是許多生活方式中之一種，相形之下，既襯托出其所有的美，也毫不留情地照出其各種醜態。於是在一個科學進步，工業革命，觀念混亂的國際世界底睨視之下，有些現代化的中國人，不禁掩臉害羞，另有些中國人則昂頭自捧自誇。現代中國開始思索了，是慢慢兒地，而且有時帶些混亂，但有時也有常識的閃現。現代中國的整個轉變，既是全民族正在經過一種長期的，緩慢沉重而痛苦的

思索過程。

現在回想到四十年前的醞釀，我們在觀點上看到一種驚人的對照。我們，以把那班行屍走肉，老而不死的北平傀儡們——曾為軍閥的齊燮元，安福系政客的王克敏，長鬚通文的前清室步兵統領江朝宗，和專門收集版本的董康——來與斯諾在「西行漫記」所描寫的氣血旺盛的共黨青年相比較，或與肩負來福鎗和行囊，徒步長征的湖南女兵相比較，我們就會得到一種印象：兩代的人是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他們精神的形相之驚人地不同，與他們體格上形相之不同一樣。

但中國在這四十年中，再生為一個近代國家的故事，其為悲劇實較甚於喜劇。經過多年的受人侵略，陷於昏亂，多年的躊躇懇求請人慈悲；多年的自己因循推諉，徒然求人緩頰，他人食言担保徒然悲傷哭泣，及以最後的幻

滅奮發，而卒決心廁身於「列國」之林；方始發現自己。祇有絕對的現世肆志，才拯救了他，並教其須依賴自己。因此中國向現代國家的途徑，每次前進一步，都是由於在幻滅中所獲得的慘痛教訓，先是在凡爾賽和會，後來是在國聯會，最後則因迫於自身的存亡，才挺身與日本作生死之戰。

我們的舊文化能救中國麼

一個龐大衰老的國家，其羣衆的惰性巨大可驚，原很容易瞭解，因此祇有外來繼續不斷的驚駭纔可使之進步。整個說來，中國並非願爲一近代國家，而是逼得走上這條路，實非過甚之言。一九〇〇年北京之圍，使絕端守舊者去位，急需的維新實現，最後終於辛亥年顛覆了滿清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和會，中國被其協約國所出賣，馬上激起了學生運動，而爲中國青年參與國家活動的開始，並使國民黨復蘇而建立南京政府。一九三二年「滿洲事

變」時，國聯會的第二次出賣，更引起強健的醒悟，即中國終須依賴自身，於是從這一九三二年起，中國纔作慢性的國防準備。因為日本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間之不斷的鞭策，因為日本對熱河、河北、察哈爾、綏遠作不停的侵佔，中國民情之憤慨與痛恨，遂一直處於沸點，而因以前生抵抗決心。最後，使中國像一個現代國家地聯合統一起來的，正是日本底武力侵略。在近代史上第一次中國是像一個現代國家似地，忍無可忍，起而作戰，全國行動若一人了。這樣，一個現代的中國，是在炮火洗禮下逐漸產生了。

中國除開現代化，無路可走。她的「現代化」是實逼處此。要是中國早就能像從西洋，不學別的，祇學和平的技術以及自人民灌輸更大量的教育，對男女老幼，賜以更大量的享受，對饑荒水災，貧窮加以更好的防止，對國

書館，公園，博物院作更多的建置，並改善警士官吏，培植法官學者！要是中國早就能夠祇利用西洋豐富的文化遺產復活自己的文學，整理她的樂歌，研究其自己的濟藥，也許對西方科學藝術早有所貢獻了！即使中國祇學會洗金煉油之技，現代廣告和商品交易之術，以及一切西洋未成熟的工業制度，與致富術等等，她也不會遭到如此的災難了！無奈西方的禮物是用兩隻手送給中國的，一隻手是和平的技術，一隻手是戰爭的技術，中國便祇好兩者都接受。

可是中國現代化，同時對中國人民含有賜福的成分。這種現代化每日因報紙無線電的傳播，以及無數與西方相接觸而促成萌生，其進行是堅決而不可或止的，故戰場命運無論如何變化也絕不能使它停頓。就是日本人，對於這個新的再生的中國國家，也無可奈何。中國此刻對日抗戰的基礎，不在中

國政府，不在中國軍隊，而在中國人民。中國現代人民，不論在氣質上，在觀點上，在對社會的態度上，在一般的開明上，較之三四十年前的情形，已斷然不同。

事實是，我們願意保存我們的舊文化，但我們的舊文化却不能夠保存我們。祇有現代化才會拯救中國。今日最關緊要的事是：現代化是否已夠深入，足以予中國新的民族主義以內的活力，使她先是阻遏消耗，最後戰勝克服那架橫暴的日本戰爭機器。中國現在不是在「和平」與「進步」之間選擇的時候。歐羅巴女神所給舊中國陰險的禮物，其給與的方式，並非如此簡單，選擇是應在「和平與奴隸」和「進步與戰爭」之間。中國已選定了後者，即所謂新民族主義。這新民族主義就是西方的禮物。

新的民族主義

倘中國打勝，我知道她會得打勝，就因為這個新民族主義精神運動成長的緣故。這個新民族主義已震驚世界。未知底細者還當它是戰爭所由產生的人造產物，沒有根基，外表的壓力一經移去，便會消滅。比較正確的管見以為這種新民族主義在戰前就已發揚高漲，因此成了日本的夢魘，使得日本須得趕緊在變形完成之前下手，否則其亞細亞帝國之夢就要消失無遺。

要是我們現在看到中國抵抗的意志不受挫折，臨以優越的海陸空軍威力也不稍屈，何故？其故即在新民族主義，它由一般的開明此種不可得見的力量所產生。

要是我們現在看到中國的團結在外面壓力之下一天天加緊的情形；看到出於日本與外間的預料之外，在一年又半以上時間的戰爭中，並無軍人政客，賣國通敵的情形，看到廣西兩將軍李宗仁和白崇禧，原係蔣介石個人的

舊敵，今相乘成見，以他們之資產與個人的服務悉數投入並與蔣氏並肩作戰，服從蔣之領導的情形；看到共產黨各將領同樣出於愛國的動機，贊助蔣氏的情形；看到一般學生也服役出征的情形；看到中國軍士倔強抵抗，在各前線冒着勢相懸殊的空軍大砲坦克而力戰不餒的情形；看到後方民氣，如根寒所謂，除了一偉大一兩字之外，無語可以形容的情形；看到年輕的大學女學生在揚子江上游一隻輪船裏，無育千百戰時孤兒，寧願自己站在甲板上淋雨，而給這些孩子們以遮蔽之所的情形；看到中國義丐求乞以助戰費的情形；看到徵募棉背心九百萬件以作軍士難民過冬之用，全國人民幾天之內就如數應徵，而且遠超過所徵數目的情形；看到黨組織劇烈，游行各地，以喚起民衆抵抗的情形；看到中國人民現對軍士抱一種新的尊敬的情形，我們可說一句，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已完成的事實，中國已確信團結鞏固確信領導

無誤，抱定抗戰決心，直至最後勝利來臨，縱使勝利之來，要經多年，亦所不顧。

苟我們聽到目睹者的報告，一致稱道中國千萬難民雖背井離鄉，家破人亡，身處困苦顛連之中，曾未聞一句怨言，責怪政府何以採取抵抗侵略者的政策，則我們可知此抵抗的基礎是在民衆，不僅在於民衆的領袖而已。

在這種長期抵抗的戰爭中，我們可以預料將有何事發生，日本猶如一輛機器優良的新摩托車，試想潰滅戈壁，或器運與沙土搏鬥。在沙土漫進機器它動彈不得以前，此摩托車將達到它這進而又永遠移動的目標否？還是沙漠將先毀滅摩托車，還是摩托車把沙漠先毀滅？再一涉想，摩托車在出發上途之時，所帶汽油，僅屬有限，它必須在汽油用完之前，趕緊向前推進，以便達到它所假想的目的地才好。苟這輛摩托車以最後一加侖油竟達到了目的地，

即日本算是贏了，不過可能的是——在我看來却是一定——這輛日本汽車將繼續在沙中一路困頓顛擺，雖然一路顛擺，仍向前進，但終究要因一無燃料而中途停止，於是祇好叫英美運貨車來拉它回到起點。當初端恃蠻勇，莽然就道，現在情形却真可憐，防泥板弄污，一根車軸弄斷，機器也沒有了滑油了。

這沙漠競賽中，還有件可怪的事，即是沿途各處，祇能找到美國添油站。日本是端靠此種油站添補油料，縱好走到一個成功的結局。日本對這添油站的雇員不斷地加以侮辱，并還把油站的籬笆也打倒，等車子將美國燃料裝好便揚長闊走，而這班油站雇員却僅僅乎抱怨日人的傲慢，沙子迷了眼，袋起購油的錢，便算數。什麼時候由叔叔（譯者按即指美國）纔會不想賺錢，停止賣油，並且像新格蘭的農夫一般，拒絕同這種無法無紀，撞破人家籬笆

的傢伙做交易，那祇有時間知道。

一邊，中國就這樣打下去，一直打下去，打得頭破血淋，遍體鱗傷，但却未被人打敗。祇有當我們將日軍從我們的土地上趕出去，或者強迫它撤退，我們暫會再費時間，思索所有這種文化底大混亂是什麼道理，並考慮又將如何來保存在我們舊有的文化。同時，可救國家的，並非我們的舊文化，而是機關槍和手榴彈。中國人民非至日本人絕口不談「共同的亞細亞文化，將它聽留原處，纔將再談及自己的舊文化。此所以一般智者不得不談一國的文化，為恐被愛武力侵略者所聽到，將其作為一種口頭禪，一種詞令，轉而去毀壞它。我們從未聽到過有什麼特別的英國或法國的文化，但當希特勒動口說起「德國文化」，或者板垣動口說起「亞細亞文化」的時候，就請世界當心！一個德國人聽到德國文化，他馬上伸手去拿槍，一個日本人說起「亞

細亞文化」，中國婦女就要嚎叫戰慄了。

這種種情形，我在四載之前，一九三五年便已看到。我看到武裝衝突，將來不可避免，我看到中國將從戰爭中得救，將從戰爭中再生，亦屬同樣不可避免的事，抑是為自然之理。我們應須明白日本對華不宣而戰，是在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就開始，從彼時以來，一直進行，迄未間斷。更須知從一九三二年到目下戰爭爆發之間這七個年頭，中國民衆是敢怒而不敢言，但就在七個年頭裏，日本自身幫助中國民衆「精神動員」，把中國民族主義抗日仇恨煽成了旺盛的火焰。

但在這樣的情勢中，有令人怪異的是，蔣介石一方面積極計劃應付不可避免的衝突，一方面却在「賭」時間。通國人民竟不知情，更不知做未來民族解放戰爭的領袖的，即是此人。這個遠東無上的棋手，從來偉大的政治棋

手之一，坐鎮在南京。一個好棋手定是個冷靜的棋手，而這樣偉大難解的人物，十年來我親見其聲譽日隆，權勢日高，又正是非人性地冷靜在他冷靜妙算，倔強（迥非中國人的倔強）的上面他再具有暗中行動，自守祕密，拒絕解釋態度之人的種種特點。蔣氏的「非人性的冷靜」，我們不僅可以在他命令張學良不必抵抗就退出東三省這點上，獲得明證，而且還可以在一九三二年滬戰中，其時戰幕已經挑開，就民衆方面講來，中國已向日本開仗，他却拒絕援助十九路軍這點上，得到明證。這在一般像我這樣有着尋常情感的人是萬難辦到的。

當然日本軍閥和外交人員間，那種玩弄的把戲，（這種把戲我們以後還能看到許多）日向頂點進行的時候，正是中國人民呼吸於全國絕望的惡劣空氣中，昏然莫知所措的時候。但，第一線希望的光畢竟在一九三五年夏天射

來了，其時日本軍閥宣告要摧毀蔣介石。我當時也沉在絕望的泥沼裏，聽到這話，認為是好到不可相信的好消息。此時日本在華軍人傲慢到無禮可說，南京日使館的一個陸軍武官竟不顧友邦禮儀，不顧駐劄身份，公然宣稱這個中國政府的領袖應該推倒，接着，華北日軍當局也好幾次發表同樣粗直的言論。這些日本軍人，原歡喜報上見名，便在向訪問者的會談中，盡情把日本的意欲表白了出來。

此種日人言論有兩種影響，每一種影響都刺激人。第一，蔣氏既然是個人，同吾人一般具有人的情緒，（尤其他是一個天生的最後防線的戰士）那他對日本這種公然宣稱的敵意當有感乎中，是當然的事，以小怨大，正如一隻渡斯的貓被人拖了倒毛而縱起身來一般。但，更緊要的是，日本的痛斥蔣氏在中國民衆的眼中立刻替他洗刷過去一切親日的「罪行」和嫌疑。中國人

民開始空前地圍集他的四周，擁護他做全國民族的領袖，中日人民彼此背道而馳，原為日已久，中國人每個都能感覺到日人說中國好話，即是壞話，說中國壞話，倒是好話。所以，此若日人宣稱認蔣氏為中國民衆的敵人的時候，中國民衆覺得他一定是他們的救星。

距此一年以前，一九三四年夏，我就已聽得蔣氏在作着武力抵抗準備的傳說，但我對這種傳說，抱着極大的懷疑。固然，廬山結嶺附近，彼時有一夏令軍事訓練班，中國全國各地將校都奉命應召前來，親聆蔣氏的訓話。一整夏，委員長立在烈日之下，向這些軍官講述抗戰的須要，武力配備的相差，和國防準備的種種，一講總是好幾個鐘頭。這些軍官帶了擁蔣的心分返防次，對於他們直接長官，我想來要減少忠誠。但除開這些軍官訓練班的談話，談話性質又總保守祕密，我毫不見一些其他準備抵抗的具體形跡。我

所感到的印象是委員長非常聰明。他對日本問題也同具愛國的熱誠，這一點他真化了莫大的苦心瞞過了我，也瞞過了全中國人。因此日本的宣稱「倒蔣」，是我所獲得的第一個保證，覺得蔣屢次宣稱當準備國防，以應付繼續侵略的話，是真心的表白。

因為蔣氏關於國人知不知道他的苦衷，素不在心，又因當時書報檢查，頗屬嚴緊；政府對日再番的要求，表面依舊採取一種強顏屈辱的政策，彷彿事情真是那樣的了，而事實上，經一九三五年夏起，蔣確在暗中作着準備抗戰的工作。當時此說盛傳，一般民衆對之，各依他們自己的判斷，信或不信。誠然，蔣氏過去在滿州事件中，在滬戰和塘沽協定中，一再表示不抵抗與讓步的事績，是於他不利，但像我一般稍悉內情的人，知蔣確在作着國防準備，以為他一切過去的不抵抗是都得以原諒的。蓋蔣氏對軍事衝突的看

法，並非從一種愛國情緒的角度，而是從軍事上的組織，交通，給養，救治等的觀點，並照一個軍人的態度，一切須欲表顯於事實，詳列成數字。而叫我歡喜的，倒並不是空軍建設，這可能被人解釋為增強他個人統治中國的力，量，而是在乍浦興築防禦工事；高中與大學的一年生須受強迫的軍事訓練，預料日人封鎖東方海岸，日夜趕築粵漢鐵路以及調查醫院設備等，這些十分可靠的消息。所以在我個人，我是早就暗中寬諒了他了。

同時，中國好像終於踏上了進步之路，這有上百的現代計劃均已迅速完成可作明證；一種新的自信精神業已產生。不過，一個進步統一的現代中國，不論過去現在，因為大部份日本開明之士所願望，但同是這個中國，在事物的本質上，却對日本一班抱建立大亞細亞帝國夢想的戰爭製造者，是一種障礙，一種威脅，因此緣故，日本加速壓力，日本軍部對於自國外交人員

以及兩國外交接洽，愈來愈不耐煩，而在後面痛加鞭策。終於，中國在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七年間，趕緊實施所定方案，其進行樣式彷彿是和時間比賽，庶幾不致中國在準備就緒出以抵抗之前，就被日本一口吞掉。事實是，戰爭的發動對日本遲了兩年，對中國則早了兩年，此即為戰爭時陷於窮境的緣故。但確因為日本不容中國在其終於力自振作，踏上進步之路的時候，繼續正常的發展，國內的改造，所以現代中國對日仇恨如此既深且烈。日本所幹的，用一句英國的俗語是「不公平」。這是既非英國的「公平之道」，也不是日本自己的「武士道」。

但當蔣氏推行一種現實主義政策，即一面準備抗戰，一面祈求和平，以便他可以從容將中國建設一個完全統一的現代國家的時候，當他努力使自己鎮靜，用一切高壓手段遏制民情爆發，使全國也處於鎮靜的時候，另一個三

方，即對他華北政策的不滿，日趨強大以至終於改變了這個堅決不撓的人物之意志。對這種意志堅強的人物，非完全綁架，是無法使之改變念頭的。容我斬截說一句罷，當時華北的局面，在外人觀察者的口中是污辱，在中國人的口中，是忍無可忍的屈辱。再比日人的走私，日人的販土更羞辱更污辱的事是：日軍竟要求封閉北平的國民黨部——中國政府所由代表的執政黨黨部——而中國當局竟應允這個要求。

藥風雨的前夜

民衆的爆發勢不可免。最足以表明當時一般心理的例證，是一個代表民衆的路警和一個代表親日官僚的次長間所發生的一件小小事故。我不妨來說一說這件事情，因為那位次長早經死了，就是對於死者有所侮辱，那侮辱也太還便宜了他。而且即使我不說，中國的小說家也非說不可的。那次長叫唐

有王，一個「小白臉」的年輕人受汪精衛的保護，是汪精衛的走狗，汪精衛任外交部長，就叫他當次長。他早上在南京就了次長職，當天晚上便搭車到滬，向日本駐滬總領事報告，討差使幹。第一件日總領事派他幹的一生意」，是用他的權力叫借了美麥借款自美回程的宋子文，船過日本登陸上東京。宋子文拒絕照辦，這次長便因第一件差事就幹不好，給日總領事狠狠申斥了一頓。可是，唐有壬還是照例每星期訪候日本總領事一次。事情弄得路人皆知，就是京滬路的路警也對這小「大亨」懷抱輕蔑。有一次，這位次長閣下，乘車到上海去，一個路警恭而敬之地叩問：是不是大人又去向日本親安了。唐有壬回到京裏，向汪精衛哭訴，說路警沒有禮貌，但哭訴以後，倒也並未辦那路警，於是這椿情態並不重大，含意却很深長的事件就此了結。

我寫出這件事情是爲使讀者們好有準備，然後才能明白以後的種種行刺案子（包括謀殺唐有壬在內）那祇是民衆猛烈反對政府內親日派的一部份行動之表現。一九三五年，國民黨召開大會，正當汪精衛立在照相機前候攝大會開幕的全體照時有人假扮攝影師，從照相機黑遮布後面開槍向他轟擊，事後逃逸無蹤。一月以後，唐次長正當回到他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時，被人就在他門前的石階邊開槍擊斃。

到一九三六年，變亂連續發生，先後相仍地力爭政府須立時和日本開戰，並停止繼續剿共。這些變亂中，以八月的廣西之變與十二月的西安事件最屬主要。無論這些變亂的真意是如何複雜，可總表出了一般的民意。這一定要住在中國方能充分感覺到此中的先兆。

壓力，反動，與爆發

有人在廣西之變時懷疑李白二將軍要求立時對日宣戰之是否出於真誠，自此番抗戰以來，當不得不改變他們當初所抱的觀念。李白二將軍曾提供諾言，一旦抵抗外來的侵略，當聯合一致，赤心贊助蔣氏，而現在確已實行此項提供的諾言。不問當初兩將軍變亂動機是為公為私，抑或是公私兩顧，不問那時立刻開戰是否可行，總之，現在都無關係；事實依舊是全國人民終於覺悟過來，若再行妥協，當危害無窮。他們既看出日人野心永無止境，也看出日人一心想征服中國，決難中途翻改，更明白再讓予中國一寸土地，決非一個自尊自愛的民族所能容忍。全國人民已到了決心抵抗日本的一點，即使甘冒大戰之危險，亦義無返顧。戰爭在空中傳播，蔣氏感到了，也知道了。

蔣氏以堅決態度，精明策略解決了這次變亂。原來一些粗糙生硬之處已經消磨，他表示更多的節制。在其應付廣西之變中，他全然成爲一個政治家

的風度。他與叛者和抗衡而獲得勝利，但此勝利絕非黨的勝利，或個人所抱主義的勝利，是遠在兩者之上。因為他一方面固佔得勝利，一方面却接受對敵者的意見，就是：阻止日人繼續蠶食中國，是絕對必須，以武力相對抗是絕對必要——雖然，因為是個軍人，蔣氏在心底裏仍求不應以中國劣勢之軍去抗日的優勢之軍，一場大戰還依舊是可能避免。而且，他斷定日本其次的侵略當在綏遠方面；及後衝突果在綏遠發生，南京當局乃在歷史上第一次動員軍隊抵抗日人或日人的煽動的侵略。結果，日軍自綏遠擊退，於是人民感到滿意，然蔣氏出兵援綏之舉，我至今認為僅僅乎在順就民意，並以為蔣氏當時相信此中並無發生大戰的危險。不過，他至少在表面，便因此完全與民衆的意願聯在一起。實際，也祇有俯從民意他才能統率全國。他是個偉大的人，並此中無天意使他冥冥中服從，但我們不能說他看錯了時機的朕兆。他採取抗

戰新政策的報酬，便是西安被困時全國人民自然向他流露的一片忠語擁戴。

苟如我所說，這幾次變亂是使中國全國對日態度，明朗結晶，至於統一，那西安事變更確實可說對中國朝野的統一立場，聯合戰線鋪了一條道路，這在此番戰爭的歷史中之意義的重大，恰如事變本身在其驚人的發展中之急劇錯綜一樣。這一點如果承認了，那我們應歸功於目下幽居無聞的張學良當初引起這次事件，並應歸功於其在全盤事件中，動機行為，全為國家，非為個人。他強迫蔣氏同意聯合戰線，答應停止無益的剿共，是正確的呢，還是不正確？這單看共產黨許多年來就已懇求這個聯合戰線，並求一個與日作戰的機會就可瞭然。聯合戰線是中國情勢合理的發展，若無西安事件，那它不見得能夠發生，中國也不會得起而抗戰。國共雙方的接近是始於蔣氏西安出險的時候，共產黨答應放棄自身的黨綱，僅要求南京當局保證抗日，保

證不再簽送出寸土予日爲報答。這樣，從一九三五年夏，日人痛斥蔣介石起，到中國人民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致起而擁護蔣氏爲全國領袖止，這一個圈子算是完成了。

我所以不嫌冗長，盡力描述戰前中國抗戰的基礎，各種勢力的漸相接近聯合，無非想使讀者明瞭這次中國抵抗，機構堅強的內部充實。我第一想表明的是，中國抵抗的力量係在一九三二——三七年間之前，並不是在以後，建立成功。這些年間，中國因日人促成吾國民衆「精神動員」得益不少。要是日人不在偽滿表現其慣用的手法，真正的意圖，要是中國在一九三一年就同日本開戰，那中國在民衆間的抗戰基礎是不會得如此深而且廣。第二，我想表明，這次戰爭是由幾種互相衝突的歷史巨力激盪而成。戰前的數年正是中國內部復興最好而又最有希望的幾年，這幾年的復興的突飛猛進又正好同

日人打算進襲中國的種種計劃，成一種比賽。第三，我想表明：中國抗戰的意志係來自民間，是由民衆着力迫使政府前進，擱置遷延時間的政策。第四，我想表明宋明亡國的主要條件在現代中國是沒有；我意思是說，在各領袖之間相互傾軋紛爭的情形是沒有。這第一應推功於蔣氏的領導，他力能使各黨各派信服其一片救國的忠心，這種愛國心腸雖然現實冷靜，但是純厚篤實；其次應推功於廣西兩將軍李宗仁白崇禧和共產黨領袖朱德與毛澤東，他們誠摯愛國，胸襟闊大，度量豁達，蔣氏曾向朱毛血戰八年，並高懸厚賞購彼等頭顱，及西安事起，生命實操諸朱毛手中，但朱毛豪俠大度，送其出險，深信中國未來對日抗戰，萬不可無此人。凡此事實，還用我來多說嗎？這種領袖間為民族解放而共同作戰的合作，我認為是中國精神再生最好的指示。回檢歷史，以與宋明末年，領袖間只顧私相爭勢奪權，一相對照，情態迥乎

照，情態迥乎不同。所以，當我看到中國目下業已如此團結一致，我又認為我們的國家已渡過她現代史上最壞的時期了。

蔣氏的為人與策略

若對蔣氏作一個心理的研究，即將是最足令人心醉的。我在此祇能討論與他領導目下戰爭有關的幾點。他不僅以強力統一中國，以巧妙的策略制勝較他年長的敵手，這原非易事，而且既比吳佩孚或袁世凱來得現代化，他也終於完成了袁吳兩人在民國建立後所嘗試失敗的事業。他一九二七年反對武漢當局，在寧另設政府，改變國民黨史全盤的徑路，事實上是獨力單身，並無幫手。當目下戰爭爆發時，他已使南京政府做了十一年的全國穩固的政府，他並且正使這個政府做中國內部復興的根據地和中心。他身經大小內戰，不少次數，有時係對抗勢不可侮的聯合軍隊，但總因他堅持到底，所以勝利

結局總是歸他。他以智勝他的政敵，以計勝他軍事的敵手，因此這些人看來總常常是錯的。他籠絡軍人，往往暫時與政治集團結歡，以便迅速達到目的。中國內政，素來紛紜惡濁，他不得不與各式的政客相周旋，爲此不得不容忍惡勢力，直至時機到時，方將其排除。他不得不自塑一個彼此團結的新行政制，他從而塑造的材料，即是舊時代遺下來給他那種不完全的人性的材料。他同每一個友打，他同每一個敵言歸于好，他在自己的秘書廳裏用手下敗將唐生智。唐生智後來改變，但又重到他手底下效勞。他在一年半中使一九三二年滬戰英雄十九路軍在國人的眼中沾辱聲名，他用錢收容敵對軍閥的將領（除開共產黨的軍官，他們是買不動的），他調散勁敵的部下分紮全國各地，以瓦解他們的軍隊。他是執拗，巧妙，敏點。他一方面是眼光遠大，意志堅強，他一方面又是冷漠無情，智足多謀。然他總是隱懷大志，赤誠愛國。

。他深思熟慮，一心謀國家的利益。他心目中有個強盛統一，獨立不倚的中國底景象，也有一個做這樣一個中國的領袖底景象。這兩個景象在心頭溶在一起，化合無痕。

講到個人方面，蔣氏持己極嚴，既不抽香烟，也不喝老酒，竟也不飲茶；他行而不談，召集一個會議，讓每個人發表意見，自己在旁默然傾聽，然後送走別人，自己下決斷的主張。他能夠站在夏天的烈日底下，向軍官們訓話好幾個鐘頭。他毫不顧自己個人的危險，不論何時如須要他的到場，他總冒了生命之險親臨前線，這到現在，已經有好多次。

關於他在戰前戰時，為國家最高領袖這一點，我以為他在極端危險的時期中，曾不慌不忙，應付裕如的駕駛了這隻國家的船，即使犯重大的錯誤，也比一般易犯的常人輩來得少。他以放棄滿洲那種超乎人性的冷靜的心境。

以在一九三二年對付滬戰的態度甘冒全國的指摘。他始終遷延時候，避免和日本衝突，直到有一天中國統一了起來，或至少處於一個更好的機會，可以使戰事陷於相持的局面，那才動手。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中，他利用政府中的親日派和外交部長向日本叩頭，一邊他終於離開南京，拒絕直接參加任何談判——他或住在牯嶺，打共產黨，或則飛行各省，打隨便什麼東西，或則至少視察水利工程，河壩堤岸，這個推托躲避的計略繼續了那麼長遠，以致那些年中蔣氏一旦搭機回京訪察一次算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情，日本人發惱起來，最後要求同蔣氏直接談判。及有人企圖行刺汪精衛，汪精衛遇刺未中卸職，蔣氏自長行政院，日本同他直接開談判，在中日談判史上便頓開了一個新紀元，這應該稱道蔣氏的在那八十三天（從一九二六年九月中起到十二月初止）的談判中，中國總提反要求來答復日本的要求。譬如，日方

要求中日通航，中國就要求日本飛機應停止飛越中國領空，以相對抗，日方提出在華合作剿共的建議，中國外長就提出中國應派遣軍隊到滿洲去消滅共產黨的反建議，第一次，中國在中日談判中，將自己視為和日本同等的一個國家。

據上所說一般人差不多要以為蔣氏之所以故意對日本屈服五六年，為的是好使中國人民抗日憤怒達到白熱的高度。這看來也許像真的，因為這些年中等待與被屈服增高了中國抵抗的精神。是蔣氏真的等待，直至全國憤激，無可管束，方才動手。我個人不以為然，等待的結果確於中國有利，但在蔣氏是非等到全國各領袖一致贊助，確有把握；又知道同日本開仗，背後不會受到襲擊，不肯下抵抗的主張。這個內部分裂的最後因素顯然是這樣一件迫近的未可或料的事，所以日本在對華發動戰爭的時候，便期望着了，但是，

彷彿一場戲法，魔術師的蔣氏終於使它消弭無蹤。

蔣氏用汪精衛及暫設冀察政務委會的方法，暫時和日本玩弄，其真正的動機我以為是如此：他一方面可以逐漸建立中國軍事的力量，一方面則一次再次努力真心剿共。俾得先把共黨消滅然後再打日本。蔣氏原有種厭共的複雜心理，這種心理起於和鮑羅廷相交往來的日子。這一點現在必得承認。他以為必能剿滅共產黨，但他不能夠，因此他抱更大的決心，非將共產黨剿滅不可。此心堅決至於成爲牢不可破，賄買的事既施諸共產黨軍官證明無用，於是長長七年，蔣氏爲剿共，化去了他最好一部份時間，也化去了中國國家收入最重大的一部份。先後五次大圍剿，更用去了不少的人力和不少的資力。到一九三二年第五次的大圍剿，他幾乎動員了一百萬兵士，他對共產黨實施封鎖，使他們無鹽無食無藥物品。他建了幾百英哩的公路，幾千個小堡

變，漸漸地，化費極大地步步對共黨包圍進逼。這猶如斯諾在其「西行漫記」這迷人的故事中所說，他沿蘇維埃區（當時逐漸向內地推進）幾乎築了一道長城。但蔣氏依舊未能獲得成功。共產黨脫出了他的包圍：他們固然被迫退出他們江西的根據地，但却動員男女老少的民衆，游擊人員和非游擊人員，拆卸工廠，帶了所有工業上軍事上的裝備物件，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向西出發，作歷史的長征。他們突破國民黨西方的陣線，穿越滇黔山中未通人跡的地區，越過川藏邊境在三百六十八天中，一共走了六千英哩（一萬八千〇八十八華里）。這是一種超乎人力的努力，全靠精神和士氣才能成功，一種勇敢的行爲，這種行爲斯諾說，實使漢尼拔越過阿爾卑斯山的長征看來彷彿是一種假日的旅行罷了。

這件事的道德教訓是：如果蔣氏打日本人同他剿共一樣的堅決不撓，如

果中國的游擊隊繼續保持那種優良的士氣，（這兩者現在都無疑問）如果兩黨現在均以國家利益為前提（這又是無疑的）那日本得化三十年才能征服中國，不要說五年十年。事實上日本的經濟組織至多至多也不能挺過三四年以上。中國共產黨領袖以十年經驗組織的游擊隊（第八路軍）之非凡的武功，已經獲得證明。蔣氏的堅決不撓也由事實表明。南京陷落後，漢口中央政治會議一班軟弱「動搖」的領袖就預備講和，僅當蔣氏一到，士氣乃重復振起，抗戰到底的決心又再斷然申明，但我上面說過一句，蔣氏有（厭共的複雜心理），所以如此說，那也是因為這種心理，使他在過去那些年中犯了政策的錯誤，錯過與蘇聯在一九三五年切實攜手的機會，與蘇聯早經攜手也許會阻止這次戰事的發生。

這次中國解放戰爭，利鈍所在，既端賴蔣氏領導的品質與策略以為關

鏈，那考察蔣氏如何才決定與日展開大戰之個人觀點及其一經決心抗戰以後，他的計劃和態度又屬如何，當頗重要。我以為他每一步驟都計算得正確，他對於此番戰爭的性質，洞見遠大，了解深切，實使我個人不得不表示嘆服，蔣氏實無愧為民族大危機中偉大的民族領袖。他心智的機敏和品德的充沛，不論過去現在，均是堪當此救國的重任。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蔣還遲疑，還試想避免大戰，這倒並非由於個人的怯懦，而是因為他比全國任何人士都明白看到這次鬥爭將是如何的意義。日本原想把事件看作一地方戰爭，在她消滅一個軍閥的小小部隊自恃消滅中國全國軍隊為他當得多的事，所以就悍然聲稱：「中國中央政府若對此事派兵援助，日本將認為是反日的『一種敵對行為！』」蔣氏為進國人眼目計，調軍北上，開赴保定，惟嚴令軍士不得攻擊，一邊，

日本在那三星期中則沿了北甯路，浩浩蕩蕩，開到大軍，連來坦克軍火，我所謂「仗」開之前，早在北平三週，令兵士建築工事積極佈防。蔣氏感到不妙，一場戰爭，勢無可免，然依舊不許中央軍隊莽然捲入戰禍。一面便在牯嶺召開全國軍事領袖會議，商討辦法，廣西李白兩將軍當場提予保證，決出力贊助，至此方纔下對日抗戰這個最後的決定。

就在那時候，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蔣氏在牯嶺發表他歷史的宣言。他先廣泛地申言抵抗的決心，要求日軍的撤退及回復盧溝橋事件以前的現狀；然後昭告國人，這次戰爭所具的意義，和戰爭所必需的可怕的犧牲，並宣稱：戰事既起，再無中途停頓妥協之理，否則中國作爲一個獨立國家的生存將萬劫不復。從這些話中我不知有多少國人了悟蔣氏所包含的意思。他現在之所以願戰。並非因爲他抱有中國軍力忽與日本相等的幻覺，而是因爲

他到此已確信內部的統一是因爲日人逼得他無路可退。他通盤籌算到戰端開後，中國勢力必向西南撤退，勢必應用焦土政策，勢必遭受蹂躪，勢必作長期的抵抗。

蔣氏有二點是計算錯的。第一是簽訂條約各國的擁護。直至今日，這位受過美國基督教教育的蔣夫人，鑒於歐西列強，對於此次太平洋上驚天動地的變故，他們自己在遠東利益的冷淡態度，和他們對日態度的怯弱可憐，輒常懷疑不止。好像日本要在此時，同時攻擊各國的樣子。第二，蔣氏對於日本軍隊的紀律，也估計錯誤。這二種錯誤的估計，使這次在中國的戰爭，如今日之慘酷無比。實則它們事實上恰巧互相對消，這因爲日本兵士的野蠻偷竊，劫掠，強姦，無惡不作，成爲中國此次戰爭中最大助力之一。

如果蔣氏祇計算錯了外國援助這一點，再由一個有紀律的日本軍隊佔領了，

必將使中國的抵抗精神，受到嚴酷的打劫。好在日本士兵佔領城池的能力，祇因沒得一種統治征服人民的基本智識的相配，而互相對消了。

上海之戰，發動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瞬即發展而為全面戰爭，這似乎要歸功於蔣氏的，但他非得日本的合作才行。日本海軍馬上就響應了。吾們要注意：華北的進犯，並沒有一個日本人的被害作為口實。最大的理由是說一個日本人「失蹤」了。自盧溝橋事變後的七月中，上海也有日本水手失蹤的同樣事件發生。如果沒有勤敬的中國警察，把這個生楊梅毒，而羞慚返航的水手找到，或許早已變成戰事了。結果他回來了，却並沒有「失蹤」，日本人感到茫然失望了。可是不多時，就有一個日本軍官，帶了手槍，在虹橋中國飛機場邊的路上經過，他被打死了。二天後，就有三十九隻日本戰艦，開入黃浦江，準備「和平」解決這次事件。在八月十三那天，中國飛機出

動襲擊日艦，此後的事，都已成史實了。

與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蔣氏宣言有同樣重要意義的，是在漢口廣州陷落以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的宣言。

「最初，」蔣氏申言：「人民應認解漢口的得失，在此次全面戰爭中的意義。此次中國抗戰的主要根據地，不在沿海或沿江，而在廣大之內地，特別是西部諸省。這是中央早經決定長期抗戰之基本政策。」

「保衛漢口之主要目的，是在保護西部之建設，及阻滯敵人之進攻，並消耗其戰鬥力。如此，在此期中，華西交通乃能發展，軍火乃能集中，華中及東南之工業，乃能移設西北及華西。事實上，唯有西北與西南之拓展，始能造成長期抗戰與民族建設之穩固基礎。亦唯有西南與西北交通線之適度發展，始能為長期抗戰而結集吾們的物力，與供應必需的資源。」

「現在所能徵集之人力物力，都已遷至內地。華西抗戰根據地之發展，已能應付初步之需要。因之全國各綫全面抗戰之計劃，即能付之實現，不必和敵人週旋於任何特殊據點。事實早經證實，進犯敵軍如果愈野蠻，吾們的抗戰意志，也愈益堅強；吾們的犧牲愈大，那末吾們的復興能力也愈快。」

不愧為一個領袖的宣言！世事的進展，必將證明這幾句話的整個意義。

蔣氏於漢口陣綫轉移之役，他根據上述原則，要求把全軍撤退，甚至以辭職的恐嚇，表明他的堅決。他思慮的冷靜，再度證實了。一月以前，第八路軍反對這個政策，要求以任何代價，保衛漢口，而以聯合戰綫的分裂，勉使蔣氏同意。此項政策的分歧，不能視為內部之裂痕，此與日本內閣許多閣員中對於政策之分歧，如出一轍，何足稱異。況且此次保衛漢口，嚴密計劃，阻滯日本前進，而予彼以可能的重創，亦頗足稱道。可是蔣氏對於此次的

立場，正可知道他用英斷的現實主義，以避免日本求之若渴的決戰，和爭取自動，強迫日本到有利於中國的山區作戰中，正可說明他正在計劃着更廣泛的抗戰呵。

如果拿了一幅中國地形圖，而研究日本進犯中國的路線。吾們可以找出截至一九三八年歲尾為止所有被佔的區域，除多山的山西以外，不會超出海面一百米突的（大約三百英尺）。可是正是在山西，吾們知道：日本一個二萬人的整個師團，在四個月的游擊接觸中，却並沒有一次大戰過，已消磨剩五千人。

中國現在所保有的區域，正是都和山西一般的。所以自一九三九年開始以後，戰事就要變更它根本的性質。日本正常在佔領區域中進行消耗的防禦戰，且進而艱苦萬狀，小心翼翼地同中國其他區域推進，中國那時就要在前

方各地，或者可說沒有前方，跟他打一種拉鋸式的攻勢防禦戰。中國不會再有在任何地點集中七八十萬兵力了。因為山區的性質，不需要如此龐大的集中。那偉大的戰鬥力，勢將分散於全國各地，自己選擇打擊敵人的地點，而使他們應接不暇。在過去一年有半的戰爭中，中國因為有廣漠無垠的土地，所以日本能任意選擇他所認為最適當的地點與時間，而加以攻擊。因之在日漸推廣的被佔區域中，中國也將有選擇攻擊地點與時間同樣的機會。就全局而視，中國可保持主動了。

日本爲什麼一定要失敗的？

現在吾們知道兩軍相爭，實則就是兩個民族意志的衝突。一方面是日本的侵略意志，另一方面是中國的抵抗意志。只是因爲日本是有決心有組織，而中國奮起抗戰，以求民族解放與生存，也有大的決心。雙方意志，同樣的

堅決，所以各方都無屈服或衰敗的朕兆。因之此次結果，將變為日本財政與中國士氣的持久力的一種試驗。那一方面有更大的持久力，就能勝利。日本名義上佔據土地愈多，他們於攻佔時的代價，和日本國內人力財力的榨取也愈大。即使就於中國最不幸的方面說；日本佔領了整個中國；那末祇要這種佔領，就可使日本滅亡而有餘。因為日本那時要補充佔領區域中一百多萬的軍隊，在四百萬極端敵視的人口的大陸上，玩着一種防禦的把戲。果然這句話，有賴於很多的假定條件——中國繼續抗戰，團結一致與高度的士氣，日本無力鞏固她的勝利而無法利用中國資源，日本財政的崩潰——然而這許多假定的條件，都有離切面客觀的事實為證，此所以日本此次戰事的失敗，為不可免。

日本又要重溫它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戰中所獲不幸勝利的舊夢了。那時戰

事結束時，事實上日本已宣告破產，所以比俄國還渴望和平，因之被迫接受一種空洞的勝利。在一九〇五年，一年戰爭終了時，日本真像一隻苦鬥多時的老雄雞，在勝利時，雖然高叫幾聲，却是倒在地上了。日本那時疲憊得要死，所以牠無法在和平會議席上，壓迫俄國支付一筆賠款。否則俄國以繼續作戰相恫嚇。此為日本一般政論家深憾羅斯福總統之強迫日本嘔出她以「勝利」得來的滿洲，而所以常鳴「難於忘情的不平」的內幕情形。前來一定另有一位美國總統出場，壓迫日本退回中國的贖物。然而非到日本陷於與日俄戰爭結果結束時同樣的經濟恐慌，她是不顧的，也是不能如此做的。等待中國人自己為他們創造這種經濟拮据的環境，英美的干涉就有可能性了。

現在日本人一定自己承認，由於他們的野蠻，狂妄，邪惡，無力保護無辜，他們是普遍地被仇恨着，恐怖着。從不逃避任何厲疫的中國人民，一等

日本兵近了，整個城市，村莊，早已逃空，而沒有法子可以引誘他們重返故土。在現代化的野蠻人類迫近以前，五千萬以上在村莊和城市中的居民，忍痛放棄他們的住宅和財產，而整批的遷移，可謂日本兵行為最好的評語。日本士兵軍官由於賄賂，劫掠，強姦而獲得的個人利益，阻礙了日本政府自佔領區域中掠奪利潤。在戰爭進程中，商業的榨取，是不可能的。消極的抵制，遺留於被佔區域中人民的極度貧乏，一般的不安寧，使他們無從賂奪，那是沒有問題的。

吾相信東京當局譴責諸如此類的野蠻行動，因為他們領會這對於日本在中國統治，有極大的威脅。吾也相信在日本國內，有一班思想正當的男子和忠貞自愛的女人們，可是不會懷疑他們的兒子和丈夫在中國所作所為是不對的。事實是這樣：你不能以一紙命令，就變更一個民族的性情。如暴發

乃一般的民族，經過了有系統的教以排外，認為其他民族都是落後，特別是中華民族，竟以為退化。這種民族的狂妄心理，決不能一夜就改變過來的。日本對於歐洲人中國人的傲慢和狂妄，是幾十年中排外教育與宣傳的結果。現在日本正在自己貪他排日排華狂妄的後果，這種狂妄有時幾乎神祕得難以捉摸。所以說日本的驕橫和野蠻，是不會制止的，同時也不能制止的。

吾生長廈門，在過去三十年中，在那裏從小就習見日本人的舉止，日本領事庇護日本人所設的煙館、賭窟、妓院的。所以對於華北日本的運輸，日本兵士的整個腐化，國格降低至大國水準之下，實是司空見慣，一些也不感覺驚奇。一個利用治外法權特權的國家，在光天化日之下，利用大隊運輸艦，沙船，卡車，再加以一大批的浪人，在領事當局直接而明確的保護之下，有計劃的鼓勵偷運，像這種公開的偷運，恐將不能再推說個人行動吧？

這個民族已經從一等中落下來了；因為凡是一個真正的大國，是絕不願如此做的。目前日本人的野蠻與無禮，是由於戰前多年間的野蠻與無禮所促成，也可說與彼民族性而俱來。在令人欽佩的許多日本民族特性中，我也不得不很抱歉地承認：在過去多年間深印吾腦中一種極端令人齒冷的一卑鄙行為」。那些坦白的日本人，一定也承認的吧！

吾不願論述日本民族特性。不過要指出日本在技術上，軍事上已高昇到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格，可是在道德上說起來，那是差得遠呢。譬如說，日本的地位，比英國低得多。這然因為日本對待中國人民的本性無法變更，東京的日本當局就不得不將計就計，希望這種野蠻狀態繼續下去。而由這種野蠻的壓力，逼使中國人，使他們銷沉下去，而放棄鬥爭的意志。當然，其結果恰巧相反。

假使日本軍事組織的目的：是要轟炸、屠殺、強姦中國人民，強使他們愛日本，而誅戮每個抗日的中國人；那末他們非將四萬萬中每一個高尚自尊的中國男子，女子和小孩，都加殺害不可。

日本人萬分虔誠地，要把抗日思想，根本剷除，那是沒有問題的。然而對於這個事情，他們過於認真，致有這麼大的一個悲劇。他們似乎不知這世間有某些東西，即使用兵艦轟炸機，也無法可施的。那些日本轟炸機，一定炸不掉「運動和反動」的自然律。

日本的命運，在海陸軍部身上註定了。他們好像命中註定的。預備完成一種不能完成的事業；而且在企圖完成的進程中，把她自身毀滅了。日本人太堅決，太缺乏幽默之感，所以不願放棄那種轟炸，屠殺，強姦中國人民的瘋狂工作。他們不願放棄，非等他們自己陷於枯竭之境而作切腹的自殺不

止。

所以此後的展望是確定的：中日戰爭自一九三九年以後，將進入一個新時期；中國的抗戰力，不集中在一處，而分散於全部戰線，並無偉大的局面，却是對於長期抗戰，益發有效；日本要防禦中國所防禦而日益推展的區域；日本在華軍隊必將立即超過一百萬；這百萬軍隊的維持與消耗，使日本在一年之內，財政全部瓦解；從今至少再有半年，可使日本深切體會蔣氏所約定的長期抵抗的性質；到一九三九年冬，破產的恐怖，強使日本自尋調解的落場，然而那時太平洋邊的列強要出來干涉了。到了一九八〇年日本人把這許多曲折，都忘記得精光，只說美國總統的「不公道」，強迫她嘔出「勝利」的贓物。

中國的前途

人類一切生活都被自己過去的歷史所支配。而現在的歷史，又在預示將來的生活。詩人莎士比亞說：『人雖死，但所爲之惡則常存。』這次戰爭的黑影，會把未來的東亞蒙蔽。中日兩國未來幾十年的歷史，亦將聽其擺佈。

這次戰爭的惡果，將使中日俱發生觸目驚心的問題。不過有一點我們最可確定的：即日本因自己國內困難太多，在相當時期內，無暇再兼顧中國的事情。加以日本國際貿易的衰落，國外信用的喪失，國內財政的枯竭，通貨的過度膨脹，工業因受戰時生產情形的改變而失去調整，公債無人購買，生活程度的提高，歸來的士兵因受戰爭的摧殘而失去了人性，變成蠻橫無理的暴徒。凡此種種，已是夠懲罰日本軍閥這大的冒險行爲了。然而，除了日本軍閥的勢力將在中國傾覆外，中國也決無力量強迫日本簽訂任何和平約定；或強制日本賠償這次在愛和平的降居身上所闖大禍的損失。日本的侵略

半途中止，已是構成日本的失敗和中國的勝利。但日本的海軍，在那時還是完整，故中國除非有外來的幫助，加強空軍的實力，決不會把戰爭推進到日本本部的，從中國方面看來，戰爭就到此結束。

那時，太平洋上諸列強，眼看日本已到或快到精疲力盡的地步，便出而調停——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因為他們爲了自己的經濟利益打算，不得不出來如此幹一下。只要他們能善用經濟上或外交上的壓力，就可迫使破產的日本接受和平。或再進一步，那幾個民主國也許會默許蘇聯，暗示蘇聯即刻動手。但這一步恐怕有遠資本主義國家的本性，大概是不會實現的，除非蘇聯沒有受到默許之前，自己早已動手了。我看那時最可能的局面是：太平洋上諸列強，說話的聲音會漸漸高起來，而日本外交界的說話聲音，會漸漸低下去。美國的民衆，到此已無日本向她挑釁的怕懼——可笑的怕懼——美國

的政府將仍採過去推掀的步調，祇願與其他國家採「平行行動」。但因為既無被捲入漩渦的危險，便會自告奮勇，強制實現和平。在那時，如果英美兩國能採取聯合行動，以武力為後盾，定可替中國向日本要求賠償。但因為美國不愛多事，對於以武力為後盾一點，決不會加以贊同。我看列強最注意的是：（一）重申門口開放政策，及重訂華盛頓條約；（二）限制日本陸海軍的擴充。這真是打倒太平洋上勁敵的一個多麼好的機會啊！我說這話，並不是對美國沒有友誼或對祖國沒有同情。須知我的批評，是建立在冷酷的事實上的。所謂一切「國際友誼」，祇不過是外交家口裏的一種語法而已，全係廢話，分文不值。要知道一切國際間的外交，不是根據於情感，而是根據於利害的衝突與調和。

假使我有力量，我將把下列「三原則」，作為未來的一個合乎公理平等

的和平基礎：

(一) 日本必須放棄「反共協定」。然後中國再和日本「合作」消滅日本的法西斯。

(二) 取消日本海陸軍部的太上內閣太上議會，和其他一切法律範圍以外的特權。然後幫助他們建設一個真正的民主國。

(三) 日本必須放棄「反華」政策。必須尊重中國領土之完整及行政之獨立。

我的「三原則」和廣田的「三原則」，一樣的動聽。但在內容上却沒有他那樣刁滑而虛偽。因為我的說話，並不是受到國內的軍事領袖授意而發的。如果不嫌我破壞「三原則」，我倒喜歡再加一條：(四) 維持中國的門戶開放。但任何國家在中國所享受的治外法權，及其他一切特殊的權利，一概

廢除。

至於中國將來在抗戰終了後與各國的關係，我可確定說：在國際友好，地位平等，相互尊敬一點上，必有一更好的新氣象。這種新氣象，是中國這次民族解放戰爭中得來的代價。實在，中國這一次打了勝仗，可算是十九世紀和西方發生關係以來第一次的勝仗，也可說是第一次打得如此光榮，莊嚴。到那時，正像日本變成了一個疲憊的失敗者，中國也變成了一個疲憊的勝利者，眼睛張不開來，兩腳搖搖欲跌，全身衣服都已撕破，喘着氣大喊勝利的口號。在此情形下，舉國上下一致感到一種內心的興奮和愉快，但正像被蹂躪了的耶路撒冷一樣，在這殘壁斷垣的上面，還得要重建起一個新的城市來。最後勝利的愉快，和民族解放的歡欣，不免要被借債的需要，沖淡一點。各民主國必抓住這個機會，利用他們的利器——經濟的利器——他們唯

一有力的利器來維持在中國的利益，黃銅臭的錢，就變為遠東國際友誼唯一的結合力。

到那時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態度，和在華的外人對中國人的態度怎樣，頗值得注意。從大體上看來，彼此的態度比過去的態度，一定要健全得多。在中國人方面的，一定會顯出一種新的自尊心。但因中國人一向神志清明，行動有自制力，同時又得向外人借債，不敢把此種自尊心，過分誇耀。在外人方面祇顯出保持固有利益的希望，存心向善，也比較客氣。中國因為自己勝利已得，極感快樂，外人因中國已替他們在太平洋上打倒了一個勁敵，非常感激中國，所以兩方面的心裏都充滿了一種慷慨的情緒，因為祇有快樂和感恩的人，才能慷慨行事。

須知中國此次抗戰，除了為爭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外，尚有許多意想不到

的效果，等到抗戰終了，她會把太平洋上的均勢局面改變。同時，因抗戰而促成了自己和日本的經濟破產，便會產生一新局面，使英、法、美、蘇、反而獲利。

我覺得我和中國外交家的意見不同。因為他們總說中國這次抗戰，是爲了尊重條約，維護條約的神聖而戰。其實，中國這次抗戰的動機，比他們所宣稱的，要單純得多。——中國是爲了保衛自己的老家，爲了爭取民族的生存而戰的。要曉得在近十年中，不論英、美、法、或地球上任何那一國，決不會爲了正理，主義，或條約的神聖而戰。那末，試問我們怎好期待精勵老練，祇顧現實的中國人而爲了一個空洞的主義去打仗呢？何況這種理想上的主義，除了在天堂裏，地球上無處存在的。而且同時誰也沒有參觀過天堂，不曉得天堂裏究竟有否實現？即使中國人一時糊塗受愚，決心要維護非

戰公約及華盛頓條約，便和日本開戰，那末只要過了兩三個月，中國看到各簽約國都在袖手旁觀，若無其事，你想中國人肯繼續下去，不放棄這種荒唐的戰事嗎？

故我論到中國抗戰的動機，便和人家意見不同。但對於因抗戰而引起一切事實上的錯綜和結果，我的意見便和他們一致的。因為中國這次單槍匹馬，對日抗戰，除爲了自己生存以外，不單是爲了維護條約，尙有其他許多爲遠東各大國所歡迎的原因。因為中國這次抗戰，無異阻止了遠東一個瘋狂的法西斯的進攻，雖然中國最初的本意，並不在此；實際上中國擊碎了下屆歐戰中德意的一個聯盟；打破了日本製造大亞洲帝國的迷夢——因為亞洲帝國一旦造成，人力物力，兩俱豐富，足以威脅世界的和平商業；同時使美國南方的產棉商，得到了保障，不像一年以前那批商人預備把棉產賣給日人，

結果把他們的買賣，從此永遠斷送了。阻止日本變成一個在經濟上軍事上足以自給的強國，使日本無力再想使人菲列濱、安南、暹羅、及荷屬印度。換一句話說，中國阻止日本的「亞洲人治亞洲」的大亞細亞主義的完成；替全世界剷除了真正的「黃禍」——一個正在向全世界軍事和商業上積極進攻的「黃禍」；阻止了日本人的排外，反白種人的瘋狂；又替美國在太平洋上削弱了一個大勁敵，擊敗了一個在行動上使全美人士懷恨正心的國家；使美國的納稅羣衆，省去好幾百萬塊錢，不用再擴充軍備。這一切就是我爲什麼要說明在將來抗戰結束之後民主國家對於中國是非常感激零涕的，因爲民主國家早已胸有成竹，絕對不願爲爭取中國的門戶開放而捲入戰爭漩渦。但在戰事結束之後，發現中國的門戶依然大開，心裏豈不高興？故他們重行進門之後，至少對於主人要客氣得多了。

那末，主人翁的中國人對他們怎樣呢？當然以禮回禮，祇好客氣才行。在那時也許有少數比較急進的軍人和黨人，會模倣日本人，對於他們新爭得的自尊心，大大地加以表演，造成一兩次對外人的暴行。但中國人天生的忍耐心，仍會露面，而蔣氏也定會出來，對於此種多財多勢的債主的失禮舉動，加以阻止。

而且，唯有心理上異常的個人或民族，才能怨恨這個那個，恨個不休。所幸中國人心理上是萬分健全的。似乎自然已將所有的怨恨，都賜予日本人；所以中國人對任何人，無論白色、黑色、抑或銅色，不再有什麼怨恨了。總之，吾確信現在中國人認日本人是真正的魔鬼。所以就比較而觀，他們至低限度，也認其他各國人民都是同於己的人類。歐美醫師，護士，傳教太太在難民營中之工作，很重視這種相反的對比。那許多在東方被人誹謗的

歐美僑民，在此戰爭中至少為國內咀罵他們不撤退的許多商人，博得不少好感，對於將來的生意經，大有關係。西方人士常能嘆賞中國人對於深情之敏銳感覺，這種感謝的偉大美德呵！美國紅十字會錯過了一個救濟中國戰區難民，孤兒，而為將來美國商業博得幾百萬華人好感的好機會。這種忽略的罪惡，是不可想的。穿了白衣的美國醫師和護士，照料中國婦孺的情景，並非是一種單獨的現象，乃是深印於各地中國民衆腦海中一幅忘不了的畫呢。可是日本堅決地不要美國紅十字會，在她東方的屠殺事業中混在一起。所以吾祇是思索而不去解釋；解釋此次紅十字會失敗的原因，不是吾的責任。吾知道美國紅十字會是一「預備為中國的救濟而接收捐款」——但，當這美國積極的精神，變為消極，而以袖手旁觀的態度為滿足，吾感覺路道有些不對了。

雖然中國現在正單槍匹馬和日本在苦鬥，然而將來總要借重外國的助

力。並由外國的干涉而締結和約。這當可使中國人民在過去一年半中，對西方各國沒有履行條約責任而發生的憤恨，緩和一些。在此次戰事進行中，由於日本向華南推進，對西方商業利益之衝突，日益明顯。而中國抵抗之不能擊破，亦日益分明，日本是不能取勝的。中國由法、英、美方面所獲得之援助，其重要性，將日見增加。鑒於日本之日漸削弱，英美之態度，自將逐漸強調。無形的抵制，對日信用之緊縮，原料之禁運，經濟之報復，和官方的行動，將逐漸增加其重要性，直到積極干涉那天的到來。諸如此類的響應，自然會促進中外的好感。將來一般的結果是：短期中在華外人之特殊地位取消，華盛頓條約之原則，則予以擁護。然後中國賴海外金融之援助，重行繼續它以前因戰事爆發而中止的民族建設工作。

中國內部政治制度勢將採取國民黨與共產黨，或蔣氏與八路軍領袖朱毛

因以前對抗而形成的一種折衷途徑。中國人容忍的傳統，將促成獨裁制度與共產制度間一種政治上的妥協，而產生一種民主的社會主義。這是中國人自己所特創的，歐西普遍知道的法西斯、共產主義、民主政治間的競爭，中國將偏向於民主政治。

和希特勒，墨索里尼，或斯太林的全能主義不同的一種獨裁政體，它的第一個趨勢，將以蔣氏為代表。蔣氏由於此次戰爭中所顯示的忠勇而賢明的領袖才能，使他個人的威名，遍布遐邇。因之，他能得整個民族的信服與愛戴。他不僅如印度甘地之為道德上之獨裁而已。他以前沒有放棄，以後也不會放棄三民主義中之民權主義。可是他要採用一種合於中國國情的方法，操縱這個整個的中央政府。手中掌握着軍事，財政，政治的大權。在這中國民主組織機構之中，造成一種真正的私人統治。因為中國面前有經濟與軍事復

興的迫切問題，自亦贊成強盛的中央集權制。吾們聽到關於三年計劃的事情很多。然而中國的環境和種族的傳統。不允許蔣氏宣告他自己為中國之一獨裁者」。同時他也不曾如此幹的。他可以跟捷克的馬塞里克一樣，並沒有什麼虛銜，却做一國事實上的領袖。蔣氏過去處處顯出太聰明而太明瞭中國人的心理。而且實際上，他現在所採取的方法，比他早年突然升至有權勢地位時，溫和得多。他絕不會採取獨裁制度的。獨裁制度究屬政府一種極端形式，而中國對於極端的事，多麼疾首痛心呵！

再就另一方面看起來，第八路軍共產青年團領袖的勢力，日見膨脹。在戰事進程中中國游擊運動的範圍，逐漸擴大。左翼份子，在民衆方面日漸得勢。所以他們將來自有綽乎有餘的權勢，使蔣氏對他們的要求，不得不括目相看。問題就是朱德毛澤東是否會要中國化，溫和，圓滑，避免極端，而趨

向於妥協呢？這個答案是：他們早已這樣實行了。那些瞭解朱德和毛澤東的人，決不至叫他們爲「狂徒」。他們早已宣告。不但在戰時，而且在戰後建設時期中，也願和國民黨合作。共產領袖，自來也沒有食言而肥的。照今日的情形看，左翼份子，對於收回地主土地的共產黨綱領的放棄，已特予顯明，而採取了民主政治的立場，願意在民主機構中，做一個合法的黨。鑒於蔣氏的領袖才能，對於這個時代裏的中國，是不可少的，所以他們已接受他的領導。他們以反對黨的地位，合法的站在普通民衆權利的立場上。——易詞以言之：他們擁護人民代議制，自由言論與集會之權，和批評國民黨之權。這許多權利，他們絕對堅持的。這種左翼黨派的存在，使國民黨不能再流入一黨專政的故轍。因爲左翼份子已達到了一個大有權勢的地位，不能再置之不問了。同時，他們的游擊戰鬥在此次戰略上，必將佔一個極重要地位，一半的

勝利，都靠這種戰鬥。所以事實上，人民也決不容許蔣氏再來一次剿共運動。而蔣氏也太聰明，再不會去發動了。所以最後結果，左派成爲保持民主形式與機構的一種穩健勢力，反對任何一黨專政的傾向。

而重要遠過於此的，左派勢將變爲代表農工大衆的一種力量，監視國民黨注意中國真正急需的農村建設。在這次戰爭中，他們也給予農人自治的經驗，訓練，與技巧。而在某種程度內，他們已把農民武裝起來，教他們軍事的防禦與自信。農村組織內部的改進要實現了。政府的意義，不是剝削民衆，乃是爲民衆服務的一句話，最後也教給他們了。

凡此所云，使吾們得到中國共產黨，將爲中國民主政治之基礎的一種似是而非之論。吾們要知道中華共和國中所演化的民主政治，和美國民主政治不同，正如美國民主政治，與英國或法國的民主政治不同一樣。中國人自有

調整，創造，以適合於他們的性質與思想的組織方法。在中國，把西方民主機構，移植於中國民主政治的舊精神中。這種精神，可說與中國一樣的古色古香了。這民主政府的機構是嶄新的，而政府存在之意義，乃以謀人福利的一種自由，寬大，公開的觀念，却是和五經中最古的孟子和詩經一樣地古老呢，中國史家根據詩經的理論，認為一個授以統治人民的政府，乃是「代天設治」，一朝政府腐敗，立即喪失「代治之權」，而人民即有權革命。

民主政府的機構是新的（因古代中國民治，是建築於鄉村自治上的，中央政府，完全採取放任態度）。這民主政治的新樣子，也有難堪的地方：那些道貌儼然的中國紳士，或許毫不客氣的運動人家選舉他們，而當選了候補人，却又淡焉若忘，並不說他們對於職務如何不配的一套謙詞。吾怕見有這等醜事發生的一天。因為過去在中華共和國統治的二十七年中，吾倒還沒有

欣賞過這種民主國的怪樣子。吾們以前都是冠冕堂皇地、靠牌頭、塞紙包才能做事的。中國未來的國會議員們，或許於接事之前，仍保持三指三讓的古風，「公而忘私」的吧？現在除了一般操縱職位的學士文人外，吾們已能在國民參政會中，見到各階級的代表了。於戰爭發動後，開過第一次會議，這是表示由國民黨把政權歸還人民的先聲。吾極願看那班在國民會議中的工農代表，如何領導他們自己。那奔走運動，黨派紛爭，選舉競爭的許多醜態；和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的偉大教訓，中國人民必將一步步地學習起來。坦白地說，這四萬萬馴良的中國人民，學這「好勇」「爭利」的趨勢，實在使吾惶惑得發抖了。

所幸這中庸之道的古老而仁慈的中國哲學，不致使這個民族，趨於行動與理想之極端。自由主義在西方沒有死，自由主義在東方也不會死的，對於

這一點，吾確實相信，終之，中國的人道主義和中庸精神，都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根基。就是這種精神，使蔣氏比歐洲的許多獨裁者稍見遜色。就是這種精神，保證專制政治和祕密警察的方法，在中國人民身上實施起來，總是失敗的。就是這種精神，調和了這陳舊的專制君主政體，不致中國人民認他們的帝王為半神聖或超人的東西。因為吾們在過去二十二個朝代中帝王的頭，砍得太多，所以吾們無從相信他們是一個神秘的太陽女神的子孫了。就是這種精神，使吾們各式各樣的神靈，都賦予人性，而使吾們跟他們開開玩笑，因為相信各種神靈，也一定有人性而合理的。就是這種精神。中華民族決不致如東京所發生的一般，因一個大學政治教授，說了一句「天皇為國家之工具，而非國家之本身」，而就把他加害。就是這種精神，廢除了許多中國的君主，誅戮了中國的暴君，推倒了許多中國的豪傑。也就是這一貫的精

新中國的生誕

◀ 實價國幣二角 ▶

著者 林語堂

譯者 民華

出版者 民社
香港百花街二九號

總經理 美商好華圖書公司
上海福州路五三號

經售處 各大書局報攤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初版